

方志彤英译《资治通鉴》之译者行为探析

黄勤 何霜

(华中科技大学 外国语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4)

摘 要:“行为—文本视域”下的“行为批评”语义分析框架显示方志彤的双重文化认同影响了其翻译动机,具体表现为方志彤在翻译选材方面,既有强烈的传承中国文化的意识,又兼顾美国文化的需求。在“文本—语言视域”下的“文本批评”语义分析框架内观之,方志彤主要采用了直译与格义的翻译方法,旨在保持《资治通鉴》的史料与文学价值,减少源文化在翻译过程中的变形。在“行为—社会视域”下的“效果批评”语义分析框架内观之,方志彤以分级尾注考证文献,展现《资治通鉴》的史学价值,满足西方社会对“三国”史料编纂法的索骥需求。方志彤的华人离散译者身份从根本上塑造了其深刻的双重文化认同,从而影响他的翻译动机,最终对其翻译选材、翻译方法的选取与注释形式的创新等译者行为发挥关键作用。

关键词:方志彤;《资治通鉴》;译者行为批评;离散身份;双重文化认同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6414(2025)02-0114-11

0 引言

北宋时期政治历史学家司马光历时 19 年所作的《资治通鉴》(1084)(下文简称《通鉴》)是一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编年体中国历史巨著。该书记载了自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 403)起至后周显德六年(959)期间长达 1 362 年的历史事件,对后世的史学研究和文化传承具有重要意义,其成就“不仅体现在史学方面,在文学和理学上亦堪称经典”(刘后滨,2015:21)。20 世纪以来,来自不同国家与领域、拥有不同身份的译者在不同时期对《通鉴》进行了多种形式的英译。参与《通鉴》英译的译者主要有华人离散译者方志彤(Achilles Fang)(1965)、澳大利亚史学家张磊夫(Rafe de Crespigny)(1969,1989,1996)、美国自由译者约瑟夫·亚普(Joseph P. Yap)(2009,2016)、华裔学者孔旭荣(Xurong Kong)(2018)以及来自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亚太学院的汉学家马克·斯特兰奇(Mark Strange)(2006)等。随着《通鉴》英译活动的勃兴,《通鉴》成为中国史学之国际性研究的基石之一,其史学价值和学术地位不言而喻。

收稿日期:2024-09-1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华人离散译者中国文化译介与传播研究”(项目编号 20BYY017)、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翻译学研究中心 2024 年科研招标项目“华人离散译者中国哲学典籍英译中的中国伦理知识翻译与伦理话语建构研究”(CTS2024028)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黄勤,女,华中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文学翻译、离散译者研究。

何霜,女,华中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在读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翻译与跨文化研究、离散译者研究。

引用格式:黄勤,何霜. 方志彤英译《资治通鉴》之译者行为探析[J]. 外国语文,2025(2):114-124.

1 《通鉴》英译研究综述

以上多种形式的译本推动了中国史书《通鉴》在西方的经典化,是中国史学典籍翻译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学界对《通鉴》英译本的讨论不多,专门研究仅见于《通鉴》的方志彤(三国部分)节译本 *The Chronicle of the Three Kingdoms*(下简称方译本)与张磊夫的三部节译本。许明武、聂炜(2021;2022)分别就方译本中的情态动词-语境、译者身份对译本的影响,与张磊夫译本进行了对比研究;后又通过对《通鉴》英译活动的考察(2024)凸显了这些节译本的重要性。此外,国内对《通鉴》英译的评论主要针对方译本。有学者认为方志彤对《通鉴》的节译体现了他“存史”的需要,即于所在国保留一份来自中国的史学研究珍品(朱政惠,2013:115-116)。同时,张执遥(2019)指出,方志彤对《通鉴》英译中的校勘学特质体现了他对读者的关注。吴原元(2011:95)认为,方志彤对《通鉴》卷69-78的英译总体上是成功的。国外对这些译本,特别是方译本的独特价值予以了一定关注。有学者认为方译本的影响尤为深远,“首次以西方语言详细呈现了三国的历史——虽非科学史,但能呈现因果关系并解释人物性格与动机,为西方历史学家所接受”(Edwards, 1953: 75),且“展示了创作一部中国历史巨著的技巧和编纂过程……这对研究司马光的学者而言弥足珍贵”(Wright, 1966: 641),“对西方读者了解中国历史有启牖之功”(De Crespigny, 1969: xvii)。

综合国内外的《通鉴》英译研究来看,方志彤节译本是值得关注的典型案例之一。该译本向西方较为准确地呈现了三国历史的原始史料、文化背景和编撰视角,契合西方学者的研究需求。它呈现《通鉴》独特的文化价值,不仅彰显了方志彤敏锐的学术洞察力和深厚的文化底蕴,更体现他推动中西文化交流的积极作用。尽管方译本的学术价值广受认可,但在这一特殊个案中,译者方志彤如何通过其独特的文化身份来准确把握西方的学术需求、采用何种翻译方法实现其翻译动机等译者行为仍未得到学界的充分关注。

2 译者行为三位一体分析框架下的方志彤英译《通鉴》之译者行为探析

方志彤^①(1910—1995)自幼接受中国传统教育,曾在上海与清华大学修习西方哲学与国学,1949年赴美后在哈佛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方志彤在美长期致力于中国经典的传授、译介及中西文化的学术研究,获得赖世和(Edwin O. Reischauer)、柯立夫(Francis Woodman Cleaves)等诸多哈佛学者的认可;后方志彤在申请美国永居签证等过程中亦得到了这些学者的支持(高峰枫,2016:106)。但在美期间,方志彤仍展现出中国文人难忍庸俗的孤洁寡傲(木

^① 有关方志彤出身,学界说法不一。著名汉学家海陶玮(Hightower, 1997)称方志彤生于日本统治下的朝鲜,其祖上是中国人;高峰枫(2016)称方志彤是中国朝鲜族人,只是生在朝鲜。但方志彤坚持自己是中国人;聂炜、许明武(2022)提及方志彤在哈佛档案中的登记表上“出生地”和“国籍”两栏填写的都是“中国”,且他在1948年申请永久居留美国的签证申请书中声称自己生于山西省安邑。

令耆,2005:129),这反映了其作为离散者(diaspora)的“文化错置”(周启星,2022:93)。他远离源文化后难以融入所在国的文化语境,因而产生孤独感与疏离感,又或导致身份焦虑……但这也促使他“作为离散者能在文化冲突与交融中保持更清醒的认识和批判精神”(夏萌,2017:129)。作为华人离散译者,方志彤的双语双文化身份既使他在情感上深切认同中国文化,又不可避免地适应并认同美国文化。一方面,方志彤坚称自己是“中国人”,对中国文化持有深厚的认同感与强烈的保护意识(Huff et al., 1977: 97);另一方面,在美国的教学、学术成就以及移民等多方面的因素,展现了他对美国汉学的支持、在美学术文化体系中的融入和获得的高度认可。由此,方志彤的双重文化认同得到了强化,他在《通鉴》等文化译介活动中努力寻求满足西方文化需求与完整展现中国文化史料之间的平衡。这既是译者学术责任的体现,也是其情感诉求的自然延伸。刘骏(2023:54)认为,离散现象中的文化译介是一种关乎文化身份、文化实践的综合性互动。鉴于此,以下我们基于译者行为三位一体分析框架,深入分析具有双重文化身份的方志彤在《通鉴》英译中的译者行为及其对中国历史与文化的传播。

2.1 译者行为三个评价视域与翻译批评三大语义框架之关系

“译者行为”是指译者身份下译者所应有的译者角色行为,包括语言性和社会性行为(周领顺,2014:25),语言性对应译者的译者角色,反映翻译的根本;社会性对应译者的社会人角色,反映社会的需求(王晓莉等,2024:126)。译者行为批评重视译者的作用以及译者与文本和社会的互动行为(李正栓等,2024:99)。对此,周领顺(2024a)进一步发展了“文本—行为—社会”三位一体的译者行为分析框架,将其分述为“行为—文本视域”“文本—语言视域”和“行为—社会视域”三个译者行为评价视域。其中,“行为—文本视域”强调译者的主动行为如何作用于文本,反映译者通过翻译决策体现的文化意志;“文本—语言视域”关注文本层面的语言使用与翻译策略,评价译者的语言性;“行为—社会视域”在社会层面考察翻译与社会的互动,提升对翻译现象的解释力。这三大视域呈递进与循环关系,可分别凝练为“行为批评”“文本批评”和“效果批评”三大翻译批评语义框架(周领顺,2024a:111)。这三个语义框架能根据情境构建意义框架,“凸显译者行为批评互动关系的理念”(周领顺,2024b:6-8)。这要求译者意识到源文本与目标文本所激活的框架之间可能存在的差异,并调整翻译策略以便在目标文化中尽量保留原文框架或引导新的框架生成,更好地指涉隐含的文化背景信息。从译者行为的三个评价视域来看,译者行为所包括的“译内行为”(文本层面翻译“如何译”)和“译外行为”(社会层面翻译“如何用”),是以译者为中心,对译者身份下的译者角色及其行为进行考察(周领顺,2022:1),在三个语义框架下即表现为在译者“行为批评”中观照“文本批评”与“效果批评”。译者身份指译者在翻译中的角色与特征(王晓莉等,2024:128)。在译者身份下解读翻译中各意志体与其他元素的互动关系研究,可以透彻解释整个翻译活动(周领

顺,2024c:77)。三位一体中的三个视域能为论文提供理论框架与逻辑结构支持(周领顺,2024c:82),在此基础上,三大语义框架能为译者行为研究提供多维度的评价路径,形成多层次的的分析框架,即“行为—文本视域”下的“行为批评”“文本—语言视域”下的“文本批评”和“行为—社会视域”下的“效果批评”框架。以下,我们将基于此,系统解读方译《通鉴》翻译过程中的译者身份与译者行为,揭示翻译活动中两者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

2.2 基于译者行为三个评价视域的三大语义框架内之译者行为批评

2.2.1 “行为—文本视域”下“行为批评”语义框架内的翻译动机

“行为—文本视域”关注译者的意志和行为之于文本的影响,“即在保持原文核心意义时适当考虑社会的需求,并主要表现为满足读者需要”(周领顺,2024a:110)。该视域下“行为批评”框架的核心元素“译者行为”“身份”“过程”与“合理性”(周领顺,2024b:10),能帮助理解方志彤作为译者的主动行为过程和“译者背后意志体意志实施的体现”(周领顺,2024a:110),探讨其翻译动机如何受到双重文化认同的影响。

方志彤的双重文化认同既促使译者本身作为华裔学者积极参与跨文化对话,亦使其精确地识别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不协调处,并对寄居地的“跨文化对话需求”进行深刻反思,从而影响其翻译选材。一方面,作为华裔学者,方志彤的翻译深植其对中国的文化认同及由此衍生的跨文化对话。1937至1947年,方志彤在《华裔学志》(*Monumenta Serica*)校对译稿,并积极发文维护、传播中国文化,为读者提供学术指导(Hightower, 1997: 399-400)。方志彤对译稿不准确之处的敏锐洞察力体现了其作为华裔学者“在中国文化的体认与感知方面的天然优势”(李鹏辉等,2024),学究式的严谨态度则加深了他对中西文化差异的理解,使他在后续的翻译活动中更精准地传达中国文化的精髓。

另一方面,长期离散于美国文化中的方志彤对中西跨文化对话表现出极高的敏感性,这体现在他对“源文化之传播与目标文化需求间存在信息鸿沟”这一问题的深刻洞察与高度重视。方志彤翻译《通鉴》中三国部分的动因之一,源于他对“西方严重依赖《通鉴》的二手甚至三、四手资料进行中国历史研究”现状的反思。在方译本面世之前,西方对中国历史的了解主要限于考狄(Henri Cordier)的《中国通史》(*Histoire Générale de la Chine*, 1920),而该书基本源自法国汉学家冯秉正(de Moriae de Mailla)1773年出版的同名著作;冯秉正的著作则译自满文版的《通鉴纲目》,这部书由朱熹删改《通鉴》而成,带有明显朱子学倾向(a “slanted” abridgment)。此外,戴遂良神父(Léon Wieger)的《历史文献》(*Textes historiques*)也广为流传,该书提供索引与中文,帮助读者区分译文与释注,其内容亦选自《通鉴纲目》(Fang, 1965: xvii)。由此,方志彤(Fang, 1965: xvii)认为,西方读者对中国历史的认知长期间接依赖《通鉴》及其衍生书籍。但因这些文献删改和倾向性解读原文,可能导致西方对中国历史的认知产生偏差,无法全面领略原著深刻的文化价值。这虽表明《通鉴》对西方的中国历史研究有

深远影响,但也反映了文化交流中源头信息的缺失,揭示了中国文化传播与西方学术需求间的信息鸿沟。尽管方志彤为中华文化的独特价值感到自豪,但他亦惋惜西方无法直接利用这部经典而可能导致源文化被误解和源文化在传播中的文化变形。

为弥合这一鸿沟,使西方读者更直接全面地领略《通鉴》的文化价值,方志彤的翻译选材主要考虑了以下三点:其一,《通鉴》中三国内容的史料价值。方志彤(Fang, 1965: xvii)认为,“迄今为止,《通鉴》仍是最好的中国通史……《通鉴》中某些时段的史料无比绝妙,我选的《通鉴》魏纪部分就是目前对三国(220—265)最简洁透彻的论述”。这反映了他对《通鉴》、特别是其中三国的史料书写的认同。其二,《通鉴》的文学价值。方志彤所译的《通鉴》或可归为记叙散文。除注析原文外,方志彤还指出他如何组织素材、统一风格等(黄鸣奋,1996);此外,译文中保留了大量中文音译,将专有名词和书名全部大写,与其他术语进行了区分(Baxter, 1965: xv),这体现了方志彤对《通鉴》语句编排与文化词等文学性的关注。其三,《通鉴》的史学价值。方志彤认识到《通鉴》中的“长编(original drafts)考异法”本就是对中国历史编纂学的一大贡献,因此选译其三国一节“以最简短完整的章节来反映司马光的编纂原则”(Baxter, 1965: xii),挖掘《通鉴》在历史编纂法上的史学价值。方志彤对《通鉴》选材与考异法的考虑使司马光的编纂动机、价值观和指导思想有迹可循,其价值对学者们来说亦是无价的(Wright, 1966: 641)。

从上述分析可见,方志彤具有双重的翻译动机,既出于双重文化认同,包括维护母国文化价值与推动所在国文化研究的诉求,也旨在填补中西文化交流间的信息鸿沟,其选材契合西方学者的需求与认可。作为离散译者,方志彤在离乡的境遇中加深了对民族认同与文化意识的体认,他将翻译视为表达文化忧思、维护原乡文化的情感寄托与促进西方认识《通鉴》价值的重要手段,而非简单在翻译中讲述母国的历史文化。因此,方志彤在翻译过程中力求系统呈现并促进西方读者理解《通鉴》中三国历史的异质性与文化价值,这直接影响他的翻译方法与语言表达。

2.2.2 “文本—语言视域”下“文本批评”语义框架内的翻译方法

“文本—语言视域”立足于译文本本身,主要围绕译者的语言性和原文的意义做文章(周领顺,2024a:109),该视域下的“文本批评”框架以“文本”和“意义”的再现为最大核心(周领顺,2024b:9)。从方志彤的翻译动机出发,结合译者的翻译方法与语言意义的传达等角度,可以更好地评价方志彤的“语言转换者”这一角色的表现。

2.2.2.1 直译正文:承袭史料记述中的精简表述

例1:识拔奇才,不拘微贱,随能任使,皆获其用。(司马光,2007:802)

方志彤译文:He recognized men of talent and promoted them, irrespective of humble origin; employing them according to their abilities, in each case he made the best use of them. (Fang,

1965: 1)

此句意为“(曹操)发掘提拔有才能之士,不论其出身微贱,依据才能交付工作,充分发挥每个人的才干”。为呈现其文化异质性,方志彤将“识拔奇才”中的“识”“拔”直译为“recognized”和“promoted”,突显了这一行为的主动性;将“不拘微贱”直译为“irrespective of humble origin”,准确反映了曹操“不论出身”的用人哲学。而“随能任使”直译为“employing them according to their abilities”,并用“in each case he made the best use of them”传达“皆获其用”之意,表明曹操根据个人特长来分配任务,确保人尽其才。方志彤采用直译力图保留《通鉴》“举撮机要”的精简行文,准确记述曹操“知人善用”的历史事件与人物形象,体现了《通鉴》的史料价值。

2.2.2.2 格义文化词:比附和解释原语文化

《通鉴》中常见文化负载词,即“某个民族或某种语言中特有的词汇,具有显著的文化性和社会性”(胡文飞等,2022:74),这是其文学价值的体现之一。对于这些能够体现文化异质性的负载词,方志彤在译本中使用格义的翻译方法使译文易于理解。

例2:青州兵擅击鼓相引去,众人以为宜禁止之,不从者讨之。贾逵曰:“不可。”为作长檄,令所在给其禀食。(司马光,2007:802)

译文: The troops of Ch'ing-chou (青州) deserted their barracks, beating battle-drums. Numerous officials maintained that they ought to be restrained, and suppressed by force of arms if they proved recalcitrant. CHIA K'UEI disapproved. Eventually circular letters (or passports) were issued [to the troops] authorizing them to obtain provisions wherever they might be. (Fang, 1965: 2)

方志彤将文化词“长檄”格义为 circular letters 通函,与动词 issue 连用,并以译入语文化中的 passports 来比附其概念、解释其功用为“允许持有者获取物资”。此译文强调了“长檄”作为官方文件的本质,展现了古代中国的治军文化,并通过“军队擅擂军鼓并弃离营地”的动乱,彰显了贾逵(人名音译并全部大写为“CHIA K'UEI”)治军有方的人物魅力。译者对原文的文化情境与文化词的意义进行了有效的转换,反映了他对中国典籍跨文化适应的考量,展现了《通鉴》的文学价值。

在“文本—语言视域”下的“文本批评”语义框架内描摹这种“文本意义的翻译转换”的翻译内行为(周领顺,2024d:2),可见方志彤在史料层面使用了直译来沿袭原文句式,甚至“不惜过度直译来呈现原文句式”(Baxter,1965:xv),以尽可能保留原文框架、在文本意义上求真;在叙事层面格义文化词,即“以译入语的概念来比附和解释原语文化”(王向远,2015:137),以适应西方读者的语义理解框架,实现译文的可接受性。这些维护中国历史文化完整性并努力将其融入所在国文化研究的行为,展现了方志彤作为“语言转换者”努力兼顾译文

忠实源语并适应目标文化,试图以此减少西方过度依赖《通鉴》衍生资料可能导致的文化变形,反映他作为离散译者对源文化的坚定维护与对中西意义框架的平衡把握。

2.2.3 “行为—社会视域”下“效果批评”语义框架内的译本社会效果

在“行为—社会视域”下,不仅要考虑译者之意志体行为的合理度,还要关注译文与社会互动、社会接受的效果(周领顺,2024a:110-111)以及译者的社会角色。围绕该视域下的“效果批评”框架内的核心元素“译内效果”“译外效果”“社会反应”与“合理度”具体分析方志彤的翻译,审视译者服务社会的努力等,有助于理解其翻译的社会功能指向。

方志彤采用“译释并举,详考文献”的方法及分级尾注的形式呈现《通鉴》的史学价值,以系统传承与呈现文化、促进中西文化交流。译文中尾注与正文紧密对应,分为不同层次。主尾注(如“2.”)对应正文每段的段前编号,用以阐释该段的背景或出处,二级尾注(如“2.1”“2.2”)则对应正文的段前编号加句后编号,考究每句原文(附繁体中文)及出处(附英文),并提供详尽的英文译释。“译释并举”指在翻译过程中结合原文、来源与本土文化语境来阐释原文的意义,提供多元化的解读空间(王超等,2023:160)。如正文中司马光对“曹操之死”的叙述:

春,正月,武王至洛阳。庚子,薨。王知人善察,难眩以伪。识拔奇才,不拘微贱,随能任使,皆获其用。与敌对陈,意思安闲,如不欲战然,及至决机乘胜,气势盈溢。勋劳宜赏,不吝千金;无功望施,分毫不与。用法峻急,有犯必戮,或对之流涕,然终无所赦。雅性节俭,不好华丽。故能芟刈群雄,几乎海内。(司马光,2007:802)

此段中的九句正文对应两段译文与九条尾注,其中两条主尾注分别对应两段译文提供背景框架和丰富人物形象;而七条二级尾注分别对应后七句正文,详列文献来源、交待司马光的史料处理方法(Fang, 1965: 15-18)。

方志彤将“春,正月,武王至洛阳。庚子,薨”译为一段,附主尾注1。该尾注引用《通鉴》原文后,还分为两部分:其一,附《通鉴》引用的《三国志·魏书》原文及其英译,交代《通鉴》省略了“(孙)权击斩(关)羽,传其首”的记载,以凸显司马光“删繁就简”的编纂理念、实现译者“尽量原本地展现司马光的编纂原则”的意图。其二,英注背景,说明曹操216年被封为魏王,并列出其相关谥号与庙号的出处,如“SKC I, loc. cit., 47b, records that TS'AO TS'AO "was canonized as WU-WANG (Martial King)“(谥曰武王)...this canonization was changed to WU-HUANG-TI(武皇帝) and he received the temple designation T'AI TSU 太祖; see Section 37”。这些英注中的“was canonized as WU-WANG (Martial King) (谥曰武王)”“WU-HUANG-TI 武皇帝”与“temple designation T'AI TSU 太祖”展示了“中国古代帝王死后拥有谥号与庙号”的文化。结合“谥号用以评价(褒奖)逝者的功绩德行,庙号彰显其正统性与祭祀中的尊位”(赫兆丰,2017:28-29)等文化背景,方志彤通过解读曹操的谥号与庙号等为读者呈现了曹

操这一历史人物的地位与形象,增强了译文的历史深度。

对于“王知人善察,难眩以伪……几乎海内”一段译文,方志彤附主尾注2。除引用《通鉴》原文外,该尾注也分为两部分:首先,引录并英译《通鉴》通过裴松之注释的《三国志·魏书》间接引用的《魏书》以及《曹瞞传》内容^①,展现了曹操的军事才能^②与持法峻刻(In the *Ts'ao Man chuan* ...we read: “...in the maintenance of laws he was harsh and exacting...”)。其次,该尾注后附有七条二级尾注,阐明译文的原文及其出处,以及司马光对原文的改写。如脚注2.2“识拔奇才,不拘微贱,随能任使,皆获其用。SSŭ-MA KUANG's own sentence, serving as a summary of the *Wei shu* passage about YÜ CHIN, YÜEH CHIN, etc”就交待了此句是司马光对《魏书》内容的总结性改写。这种分级尾注为译文提供了学术性的背景支持,也通过详尽的引证和解释增强了译文的权威性,展示了方志彤对《通鉴》史学价值的精准把握与呈现。

从“行为—社会视域”下的“效果批评”框架来看,“直译内容”和“格义文化词”的翻译方法使译文达到“忠实于原文语义框架与意义表达”的译内效果;分级尾注中文献的全面索骥使译文达到了“构建了特定情境下的多元解读空间”的译外效果。由此,方志彤通过联系原文的特定情境及其语义框架与引导新的解读空间生成的方式,在译文中指涉了原文本的意义框架、较为完整地呈现了其文化价值。这正是方志彤受离散经历影响而形成双重文化认同的体现。作为离散译者,方志彤的双重文化认同强化了他传承中国文化的责任感与回应西方学界研究局限的自觉,使其在翻译中不仅承担语言转换的任务,还通过注释方法的创新,完成了从“语言转换者”的译者角色向“史料研究者”的社会角色的转变。由此,方志彤的翻译赋予了《通鉴》新的诠释框架和对话空间,使其译本在全球范围内取得了广泛的传播效果。

从全球馆藏数据和书评来看,方志彤节译本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反响。世界最大的联机联合目录数据库 Worldcat(基本数据库)显示(检索时间:2024-08-26),方志彤对三国内容的节译本全球馆藏量达345家,而其他相关译本分别为:张磊夫三个节译本 *The Last of the Han* 204家、*Emperor Huan and Emperor Ling* 78家、*To Establish Peace* 86家;孔旭荣节的节译本 *Selected Essays from the History as a Mirror* 6家;Joseph P. Yap 的两部节译本 *Wars with the Xiongnu: A Translation from Zizhi Tongjian* 204家、*Zizhi Tongjian: Warring States and Qin* 6家以及马克·斯特兰奇(Mark Strange)对《通鉴》侯景之乱的译介与史源考。尽管斯特兰奇的文献被收录于1683家图书馆中,但其较为专业,受众范围有限,无法媲美方译本。此外,凭借高水平的史料、文学和史学价值,方译本在国际重要汉学期刊上获得了高度评价。如知名汉学家薛爱

① 原文为:From *Wei shu* 魏书 (quoted...commentary of P'EI SUNG-CHIH 裴松之) and *Ts'ao Man chuan* 曹瞞传 (quoted *ibid.*, 47b, commentary) (Fang, 1965: 15).

② 原文为:...mowed down the numerous scoundrels (太祖自统御海内,芟夷群丑). In his military operations, he followed in the main the tactics laid down in the *Sun-tzŭ* 孫子 and *Wu-tzŭ* 吳子...By nature he was temperate and frugal, not given to pomp and adornment (雅性节俭 不好华丽) (Fang, 1965: 15-16).

华(Schafer, 1952: 74)表示,“就我所知的汉学家中,尚未有人能将《通鉴》中连续的几句话翻译成欧洲语言”,而方志彤填补了这一空白;英国汉学家杜希德(Twitchett, 1967: 251)认为,“该译本是西方学者研习三国的最佳启蒙书目与学习中国史学的绝佳文本”。同时,“方志彤对注释的整理及其对晦涩段落的注解,为司马光史学思想的权威研究奠定了基础”(Leban, 1966: 251-252)。美国圣约翰大学教授兼副校长薛光前(Sih, 1966: 518)指出:“方志彤在《通鉴》译本中对中国第三世纪政治发展的英译贡献不可估量。”在“行为—社会视域”下的“效果批评”框架内,上述数据与评价反映出方译本不仅满足了西方学者对中国历史相关知识的获取需求,还体现了译者服务于两种文化交流的高水平翻译工作和史学研究,为中西方文化的交流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3 结语

“不同身份的译者会有不同的译介行为”(许多,2018:86),方志彤的离散身份从根本上塑造了其深刻的双重文化认同,从而影响了其翻译动机,并最终决定了其选材、翻译方法与注释形式。在“行为—文本视域”下的“行为批评”语义框架中,方志彤受到双重文化认同的深刻影响,他的翻译动机出于完整传递原乡文化中的原始信息与满足异国读者文化需求的双重考虑,在选材中体现了传递母国文化价值与促进所在国研究发展的双向情感寄托。在“文本—语言视域”下的“文本批评”语义框架内,方志彤为减少文化变形而采取了直译与格义的翻译方法,以确保文本和叙事上的求真、维护母国文化的异质性。而在“行为—社会视域”下的“效果批评”语义框架内,他的双重文化认同增强了其文化遗产的责任感并回应了西方研究局限的意识,使其由“语言转换者”转变为“史料研究者”,进行全面的史料索骥以务西方的历史研究之实。正是方志彤的离散身份对其译者行为的深刻影响,使方译本呈现出高度的文化融通性与多维的意义诠释空间,成为西方学界深入了解中国历史的重要渠道。概言之,在译者行为三个评价视域对应的三个语义框架中开展译者行为批评,可见方志彤在翻译选材、翻译方法等整个翻译过程中的行为特征,即对母国文化价值强烈的呈现、维护意识与文化传承意愿。这些意识与意愿是离散译者的双重文化认同中独有的、对母国文化认同与情感羁绊的体现。

参考文献:

- Baxter, G. W. 1965. Editor's Preface[G]// Achilles Fang. *The Chronicle of the Three Kingdoms(220-265): chapters 69-78 from the Tzu Chih Tung chien of Ssu-ma kuang*.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xi-xv.
- DeCrespigny, R. 1969. *The Last of the Han: Being the Chronicle of the Years 181-220 A. D. as Recorded in Chapters 58-68 of the Tzu-Chih T'ung-Chien of Ssu-Ma Kuang*[M]. Canberra: Centre of Oriental Studies,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 Edwards, E. D. 1953. Review of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Studies VI. *The Chronicle of the Three Kingdoms (A. D. 220-265)*.

- [J].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1/2): 75.
- Fang, Achilles. 1965. *The Chronicle of the Three Kingdoms* (220-265): *Chapters 69-78 from the Tzu Chih T'ung Chien of Ssu-Ma Kuang*: I[M].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Hightower, J. R. 1997. Obituaries[J]. *Monumenta Serica* (1): 399-449.
- Huff, E. & R. Levenson. 1977. *Elizabeth Huff: Teacher and Founding Curator of the East Asiatic Library: From Urbana to Berkeley by Way of Peking*[M]. Berkeley: The Regents of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 Leban C. 1966. Review of *The Chronicle of the Three Kingdoms* (220-265): *Chapters 69-78 from the Tzu Chih T'ung Chien of Ssu-Ma Kuang*[J].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2): 250-252.
- Pokora, T. 1966. Review of *The Chronicle of the Three Kingdoms* (220-265): *Chapters 69-78 from the Tzu Chih T'ung Chien of Ssu-Ma Kuang*[J]. *Archiv Orientalní* (34): 155-156.
- Schafer E. H. 1952. Review of *The Chronicle of the Three Kingdoms* (220-265): *Chapters 69-78 from the Tzu Chih T'ung Chien of Ssu-Ma Kuang*[J]. *The Far Eastern Quarterly* (1): 73-75.
- Sih, P. K. T. 1966. Review of *The Chronicle of The Three Kingdoms* (220-265): *Chapters 69-78 from the Tzu Chih T'ung Chien of Ssu-Ma Kuang*[J].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3): 518-519.
- Twitchett D. C. 1967. Review of *The Chronicle of the Three Kingdoms* (220-265): *Chapters 69-78 from the Tzu Chih T'ung Chien of Ssu-Ma Kuang*[J].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London*(1): 251-252.
- Wright, A. F. 1966. Review of *The Chronicle of the Three Kingdoms* (220-265): *Chapters 69-78 from the Tzu Chih T'ung Chien of Ssu-Ma Kuang* (1019-1086)[J].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2): 640.
- 陈恒. 2022. 不灭的亚历山大大帝[J]. 读书(9): 110-118.
- 高峰枫. 2016. “所有人他都教过”: 方志彤与哈佛在京留学生[G]//古典的回声(二集).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87-102.
- 赫兆丰. 2017. 正统的诉求与建构——对刘宋文帝“太祖”庙号的考察[J]. 北京社会科学(8): 28-38.
- 胡文飞, 张俊. 2022. 汉英词典的文化词研究综述(2001—2020): 回顾与前瞻[J]. 外国语文(1): 74-81+122.
- 黄鸣奋. 1996. 20 世纪中国古代散文在英语世界之传播[J]. 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4): 100-105.
- 李鹏辉, 张威. 2024. 橘枳之间: 《三国演义》华裔汉学家群体译者行为研究[J]. 外国语文(3): 124-134.
- 李正栓, 徐童歆. 2024. 邓恩《跳蚤》译者行为研究[J]. 外国语文(5): 97-110.
- 刘后滨. 2015. 《资治通鉴》为什么不可替代? ——兼论历史学在大学通识教育中的地位[J]. 中国大学教学(8): 20-25.
- 刘骏. 2023. 一个概念的经验重构: 评《作为翻译和解殖的离散》[J]. 中国图书评论(10): 51-58.
- 聂炜, 许明武. 2022. 学者译史与史家译史: 译者身份对翻译过程影响举隅——以《资治通鉴》方志彤、张磊夫译本为例[J]. 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4): 81-86.
- 聂炜, 许明武. 2024. “通鉴”百年西传史——以《资治通鉴》英译活动(1952—2018)为考察中心[J]. 外语导刊(3): 148-157+161.
- 木令耆. 2005. 方志彤与“他们仨”[J]. 二十一世纪(香港)(2): 129-132.
- 司马光. 2007. 资治通鉴(一)[M]. 北京: 中华书局.
- 王超, 曹顺庆. 2023. 比较文学阐释学的创新缘起、理论特征及实践方法[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9): 155-162.
- 王向远. 2015. 以“逡译/释译/创译”取代“直译/意译”——翻译方法概念的更新与“译文学”研究[J].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5): 132-142.
- 王晓莉, 胡开宝. 2024. 语料库批评翻译学视域下译者行为研究: 前沿与展望[J]. 外语与外语教学(3): 125-134+150.
- 吴原元. 2011. 略述二十四史在美国的译介及其意义[J]. 历史教学问题(5): 94-100.
- 许多. 2018. 译者身份对翻译过程的影响——以罗慕士译本中的曹操形象为例[J]. 外语教学(6): 85-89.

- 许明武, 聂炜. 2021. 基于语料库的《资治通鉴》英译本语境重构探究之情态动词路径考察——以方志彤、张磊夫译本为例[J]. 外语电化教学(5): 34-40+54-55.
- 张执遥. 2019. 论方志彤典籍英译的读者取向[J]. 东方翻译(6): 53-57.
- 周领顺. 2014. 译者行为批评: 理论框架[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周领顺. 2022. 译者行为批评“行为—社会视域”评价系统[J]. 上海翻译(5): 1-7+95.
- 周领顺. 2024a. 译者行为评价系统的学理性[J]. 外语导刊(1): 106-114+160.
- 周领顺. 2024b. 翻译批评的跨学科定位: 框架语义学视域[J]. 中国翻译(2): 5-13+189.
- 周领顺. 2024c. 译者行为研究及其理论建设一体化路线图[J]. 外语教学(5): 77-83.
- 周领顺. 2024d. 译者行为互动关系分析[J]. 外语研究(3): 1-5+112.
- 周启星. 2022. 从文化研究到文学研究: 离散理论的演进、转向及问题[J]. 文艺理论研究(05): 91-102.
- 朱政惠. 2013. 美国学者对中国史学的研究探要[J]. 史学理论研究(3): 115-126.

An Analysis of the Translator's Behavior in Achilles Fang's English Translation of *Zizhi Tongjian*

HUANG Qin HE Shuang

Abstract: Within the semantic framework of “Behavior Criticism”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Behavior-Text”, Achilles Fang's bicultural identity influences his translation motivation, especially his material selection, reflecting his commitment to preserving the culture of his hometown and his consideration of the needs of foreign cultures; within the semantic framework of “Text Criticism”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Text-Language”, Achilles Fang predominantly employs literal translation and the method of “geyi” (analogical interpretation) to preserve the literary and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of *Zizhi Tongjian*, aiming to reduce the cultural distortion; within the semantic framework of “Effect Criticism”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Behavior-Society”, Achilles Fang uses graded footnotes to substantiate the documents and highlight the historiographical value of *Zizhi Tongjian*, addressing Western society's interest in the compilation of “Three Kingdoms” historical materials. Research indicates that Achilles Fang's identity as a diaspora translator fundamentally shapes his bicultural identity, which influences his translation motivation. This identity-driven motivation has critical impact on key aspects of his translator behavior, including content selection, translation methods, and innovations in annotation style.

Key words: Achilles Fang; *Zizhi Tongjian*; translator behavior criticism; diasporic identity; bicultural identity

责任编辑: 龙丹